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特征与支撑

杨虎涛

●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

● 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单纯的数量比例指标，不能只看自立自强的“量”，而要更多地强调自立自强的水平高低

●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增强我国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重要保障

●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稳固的市场资源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完成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重构，促进投资需求的改善，又要破除制度性障碍，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消费需求的提升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原则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初次分配中重点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要充分发挥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点在于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三次分配中重点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改善区域、城乡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既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还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不同区域的区域优势与发展潜力，缩小区域差距。

(三)

总之，虽然经济循环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但具体到不同起点、不同禀赋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循环中的内外侧重组合的政策选择和发展历程也必然存在差异，由此也形成了不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路径。历史地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再到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与侧重的变化，不仅受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约束条件影响，而且也与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就当下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有利于在社会总资产运动过程中不断提升本国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形成，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巨大贡献。厘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特征与支撑，对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内涵，积极推进其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制产业活动的布局和利益分配，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等在“两个补偿”(即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中所占的绝对比例并不高，但这种补偿能否顺利完成，却往往决定着整个产业活动能否持续、经济循环能否顺利实现。如果不能占据原创技术的“策源地”，担任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缺乏关键领域“两个补偿”的控制力，就难以实现长期、稳定且效益和规模不断增长的经济循环，这正是实现自立自强的意义所在。但是，无论是实现自立自强，还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都要避免和防范一些认识误区。要认识到，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以及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总资本运动都难以完全通过本国市场来完成“两个补偿”。在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时，能否借此不断强化自立自强能力，能否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拓展国内市场规模、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程度，是判断经济循环绩效的重要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单纯的数量比例指标，不能只看自立自强的“量”，而要更多地强调自立自强的水平高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不仅有利于应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也有利于应对全球价值链动态重构过程中技术冲击。综合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有效手段，就是着力扩大内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和服务于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国内分工水平的深化和供应链完善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应对“断链”“卡脖子”的冲击，而且有助于国内大市场的稳固；而强大的国内大市场形成的稳固基本盘，也会对全球要素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产业竞争力，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国内大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定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强的推动力。因此，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增强我国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重要保障。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稳固的市场资源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但必须认识到，市场规模并非人口、地域的同义语，而是分工水平、劳动生产率

和收入水平高低的经济映射。市场规模的扩展，是不断提高的可支配收入带来的消费需求提升、不断深化的分工水平和产业协同带来的投资需求增长的产物。但市场资源优势不会自动产生，只有通过创新不断改进供给侧质量，在不断创造市场过程中，推动经济循环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良性增长，从而充分利用、发挥、巩固和增强市场资源这一巨大优势。而这一过程要不断循环往复，就需要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以保障其连续性和完整性，使经济循环不被打破。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促进两类需求的提升与改善：一是因分工深化和产业协同加强所带来的投资需求提升，二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从而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两类需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通过创新推动分工深化，使生产率提升和实际工资提高保持同步增长时，两类需求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和互激式增长。

在对投资需求的改善和提升过程中，当前的关键在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完成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重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典型特征，就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数字经济不仅将重塑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而且将改变现有的分工和贸易格局。从改善和提升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渗透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同时，也将优化产业体系，促进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规模扩大和多样性的增长，从而不断提升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投资需求；而生产率的提升，亦为实际工资增长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也可以为畅通国内商品流和资金流提供支持，降低流通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在消费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则可以提升消费的便捷性，这都有助于形成统一、畅通的国内大市场。当前正在兴起的以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不仅涵盖了信息通信技术，也深远地影响着制造技术。技术革命的这种发展，也要求在生产方式上作出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对新一代数字技术重塑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主动性适应。

在消费需求提升方面，一是破除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障碍。要使劳动者收入尽可能地转化为消费支出，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就不能使劳动者承受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此，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事关民生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满足不断升级变化的多样性消费需求，需要补齐消费发展短板，使高质量供给更好

高水平开放促发展改革和创新

杨长涛

的外部环境。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团结一切愿意与我国合作的国家、企业和组织，有利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从而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推动“五个坚持”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与多种全球性危机叠加的严峻挑战，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动高水平开放，既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抉择。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开放，要坚持联通内外、坚持系统观念、坚持主动作为、坚持衔接国际、坚持开放安全，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发展改革创新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坚持联通内外，促进双循环畅通无阻。高水平开放，既要面向“外”，更要面向“内”，实现“内”“外”互促。应立足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二是坚持系统观念，完善全面开放新格局。高水平开放，不是某个领域、某个地方、某个方向的单兵突击，而应加强统筹协调，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制造业领域开放与服务领域开放、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更好结合，增强对外开放的全面性、系统性。三是坚持主动作为，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应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大自贸港、自贸区制度创新力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开放的主动应

对经济全球化逆境。四是坚持衔接国际，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在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开放的突出特征。应适应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变化趋势，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导向，深化相关领域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改革，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的融合发展。五是坚持开放安全，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形势下，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对外开放各领域和全过程，将构建开放安全保障机制作为高质量利用外资、高水平走出去、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创新思路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防范化解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可能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重视四个方面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更加重视四个方面：第一，大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从贸易主体、贸易平台、贸易规则等方面推动融合，打通内外贸两个体系的壁垒，是畅通双循环的重点之一。应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等衔接，推动建立内外贸统一的质量技术标准。大力推进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建设一批公共平台。进一步畅通进口商品流通渠道，推动进口和境内流通无缝衔接。

第二，大力推动高水平双向投资。这是境内外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衔接畅通的必由之路。从引进来看，应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准入，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拓展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高水平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的作用更加显现。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创新思路、系统推进、突出重点，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把握必然要求

总的来看，扩大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从供给端看，有效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升级，仍是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主要问题所在。通过扩大进口引入先进技术设备、紧缺能源资源和优质消费品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缺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需求端看，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在满足境外需求的同时，亦能促进国内产能优化和产业升级。去年，我国出口额增长21.2%，有力提升了相关产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有利于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科技创新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都面临一些痛点堵点，要求用深层次改革的办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竞争有序、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要求，与国际经贸规则从“边境上”迈向“边境后”，从传统贸易投资迈向包括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共享发展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通过拓展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能够为改革提供重要动力，加快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看到，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严峻

